

十年来：

理论·政策·实践

——资料选编 ⑥

沈 冲
向 熙
杨 冲
主 编

求实出版社

十年来. 理论·政策·实践

——资 料 选 编

(第 六 册)

沈 冲 向 熙 扬 主 编

求 实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黄子毅 钱恂豪

封面设计：王 岐

十年来：理论·政策·实践

——资料选编

（第六册）

沈冲 向熙扬主编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20印张 519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80033-084-2/D·30

定价：7.15元

目 录

精神文明建设

概述	(3)
一、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15)
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81)
三、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23)
四、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精神文明	(163)
五、发展新时期的文学艺术	(200)
1.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	(200)
2.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48)
3.关于创作自由.....	(273)
4.改革文艺体制.....	(301)
六、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	(316)
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365)
1.对《苦恋》进行批评	(365)
2.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402)
3.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	(457)
4.1987年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73)

精神文明建设

概 述

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确立的。十年来，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里选编的资料，共分七个部分，概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和战略地位的确立

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接着，李昌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李昌的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并不断地加以完善。

邓小平于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98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没有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同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深入持久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地位，它和物质文明两种建设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密切关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它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思想建设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并且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全党要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十二大之后，中央、地方和军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正如邓小平说，就全国来看，效果还不够理想，这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1986年9月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中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这个决议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的特点在于，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十二大的精神，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了改革开放；一切着眼于团结和建设。全党认真贯彻这个决议，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二、关于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仍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1982年4月胡耀邦约见邓力群和其他一些同志，就思想政治工作作了专题谈话。他认为，近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很好地抓上去，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看起来，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系统地总结经验不够，对当前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及其特点研究得不够，方法也不那么得当。因此，全党都要系统地、深入地想想

这个问题。1985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①问题。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提出，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李先念在讲话中要求，凡是这几年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方和单位，一定要限期切实加强。

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必须努力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在这方面，理论工作者做了一些探讨，比如：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新旧思想观念交替时所引起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思想政治工作要开创新局面，必须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等等。赵紫阳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工作是中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的保证，在改革、开放、搞活^②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工作的内容，创造新的形势和方法。

三、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开展以“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和“三热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活动最先是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九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活动。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爱”活动，于是，汇合成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统一活动。1983年初中央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以便有领导地开展这项活动。李先念为1984年全民文明礼貌月的到来发表电视讲话中提出，不同地

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创造性，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扎扎实实解决几个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对改变社会风气影响较大的实际问题。福建省三明市坚持抓精神文明建设促物质文明建设，使该市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十大变化，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1985年1月万里在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全委会上指出，各行各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抓典型、学典型，使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深入开展，把两个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在第一个“文明礼貌月”结束时，他讲了八个字：事在人为，贵在坚持。1983年他又补充了八个字：提高一步，讲求实效。万里说，今年我再加八个字：抓得更紧、更实、更好。

部队在进行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积极和驻地人民群众一起共建文明村、文明街、文明镇、文明学校等活动，取得了可喜成果，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到1986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军民共建的文明工厂三千四百多个，文明村近一万二千个。198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要注重实效。

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同时，还兴起了向张海迪等先进人物学习的活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分别题词，号召学习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精神。中央军委授予朱伯儒“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荣誉称号。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解放军英模汇报团，两个多月内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巡回講演近千场，直接听众五百万人。这些活动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都受到了教育。

四、在对外开放中建设精神文明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

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他在1982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会随之而来，问题是要消除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反对这些坏东西的同时，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谈到开创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局面时也强调指出：对外国一切先进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努力学习和钻研；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坚持这“两手”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至于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甚至腐化堕落，那是难免的，就是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同样会发生。

有人认为：实行对外开放物质上有所得，精神上有所失。在他们看来，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消极影响，实践是最好的回答。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说，从广东省的范围来看，哪里更加开放，哪里经济、技术、文化发展就更快；反之，凡是比较闭塞、不那么开放的地方，发展也就慢一些。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但决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影响，我们应当是排污而不是排外。《光明日报》评论员指出，应当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对外开放为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胡启立说，不能因为出现一些个别现象，就得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下来了”这样一条结论。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一大贡献，就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强大的活力，对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还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以《决议》的精神为指导，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并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为精神文明建设带

来了积极的影响。

五、发展新时期的文学艺术

(1) 关于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

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文艺和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关系？这是关系到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1980年党中央在总结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国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总方针，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指出了正确方向。周扬、王若水等分别撰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为什么要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周扬在文中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和政治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看成只是一种从属关系，胡耀邦1980年2月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文艺工作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谈话，特别强调领导文艺工作的要懂得文艺战线上的思想发展的规律。

1986年春，朱厚泽在中国音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期间和大家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妨碍文艺家的创作自由，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坚定性，要依靠作家、艺术家高度的创造性来实现。他提出，要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宽松的舆论环境，以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李瑞环在天津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结合天津的实际，着重谈到在艺术实践中必须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他认为，能否自觉地坚持创作自由，努力开创宽松、稳定的创作环境，是一个是否按照艺术生产规律办事的问题，胡启立在上海约请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部分同志座谈时说：我们党对文艺既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大方向，又要取宽容的态度，要允许作品有缺点，作品出

来后，可能有批评，但这是正常的评论。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应当有一个民主、和谐、融洽的环境，需要有一个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同心同德的气氛。这些谈话在我国文艺界、理论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2）关于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这个问题上，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不成功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历史教训，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报告中说，究竟有哪些主要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呢？首先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1980年《人民日报》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赵丹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他说，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了，同年，周扬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说，文艺战线上需要继续清理“左”倾思想，同时又要严重注意当前文艺界某些自由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越出社会主义轨道，这是很危险的，必须加以反对和克服。理论界发表文章认为，开展正确的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夏衍说，加强党的领导，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要说两句话，单说一句话不行，

（8）关于创作自由

1984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王蒙说，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真正的到来了！在大会上，胡启立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致祝词，他说明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必要性，阐明了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张光年在报告中指出：由于长期“左”倾思潮的影响，我们不少同志讳言创作自由，似乎一提创作自由，就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自由泛滥之虞。其实，创作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社会主义文

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科学地阐明它。

(4) 关于改革文艺体制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刊登了傅佑、马秀清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来信提出了当前文艺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了。文艺领域的精神生产，面临着一个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迫切问题”。1983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剧院一团一队试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报道，评论员说：文艺事业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不能发展。140名文艺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对文艺的现状普遍表示了不满与担忧，中国文艺向何处去？他们的结论是：改革，舍此别无选择！

文化部部长们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文艺体制改革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后面。但是，他们表示对文艺体制改革的成功充满信心，以加快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对于国营、集体、个体剧团上演的剧目，谁演什么戏，唱什么歌，政府文化部门现在和将来一般都不要审查。

六、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负责同志多次申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中，1980年2月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中，以及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都一再肯定要坚持“双百”方

针。1983年1月《人民日报》以“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有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双百”方针同自由化联系起来，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因此对“双百”方针虽不公开反对，但是总不热心。也有少数同志把“双百”方针看成是可以脱离任何原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对“双百”方针作自由化的曲解，是错误的；把自由化归罪于“双百”方针，同样是错误的，“双百”方针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正确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正是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的有效途径，周扬说，“双百”方针是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自由问题，只有保证必要的自由才可以更好地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保证这个自由，就可能造成文艺工作者与党的隔阂以至对立。

早在1980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提出，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创造最适宜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气氛，首先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放”的方针，朱厚泽1986年8月在会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说：要有利于我们整个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学的繁荣、艺术的繁荣、理论的发展、学术的昌盛，我们应该提供和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不是从全局上，从总体上也需要同一种比较安定、比较协调、比较和谐的环境，以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利于理论、学术的探索呢？如果说这样一种看法可以考虑的话，那么，对于学术界、文艺界、出版界在向前开拓、探索、发展中，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答案、以及出现的新的疑难、新的分歧、一些值得探讨的事情，就应当在一种比较平静、比较协调、比较融洽的气氛中来进行讨论。同年6月，胡启立在中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领域里的具体体现。为了繁荣科学技术，造就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局面，必须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学术上的大胆探索、自由争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这些思想在十

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得到反映。

在“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年之际，陆定一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在医院写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于光远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一文中，对双百方针的坚决提出而又很快地被废弃的原因，做了历史的分析。《人民日报》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新观察》也刊登了《政治问题应当自由讨论》的署名文章。经过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8年春，党中央领导胡启立、芮杏文重申要继续坚持贯彻“双百”方针。

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8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批判。十年来，集中的批判活动有过三次。

第一次，在文艺界开展对《苦恋》的批评。周巍峙说，文艺界有少数人要求“绝对自由”，争取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利”，要求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应当进行公开的严肃的批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发表长篇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邓小平找宣传部门的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时，也特别批评了《苦恋》。周巍峙认为，对文艺界的自由化倾向，绝不能听之任之，《苦恋》作者白桦写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说由于自己的立足点不对，创作出象《苦恋》这样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胡乔木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远远不是文化、思想战线的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更大的是在经济战线方面，经济战线上实实在在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

化现象。

第二次，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周扬在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论文最后部分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关于异化问题，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周扬的这篇论文，受到某些同志的反对和批评。4月30日《体育报》以《警惕精神污染》为题发表社论，《中国教育报》9月22日发表题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的社论。9月下旬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10月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着重讲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他指出，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接着，从理论界到文艺界，从高等院校到党校，从城市到农村，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周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首先应当自我批评”。不久，党中央规定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政策、界限，确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党中央和人民已有定论，每个党员都不能离开这个定论自行其是！”

“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本资料选编搜集了自1980年到1986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观点。

第三次，1987年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1987年元旦献词：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安徽日